

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

0317727

1981

1

戲劇論叢

XIJU LUNCONG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03614

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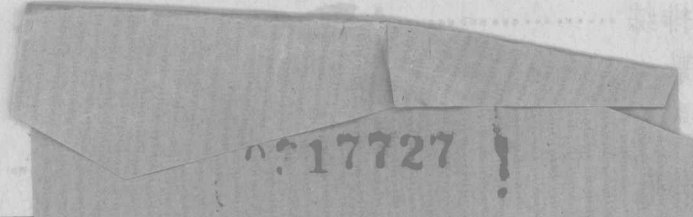
丁卯年

(1) 前言
(2) 目录
(3) 戏剧理论
(4) 戏剧史
(5) 戏剧文学
(6) 戏剧表演
(7) 戏剧舞台美术
(8) 戏剧音乐
(9) 戏剧服装
(10) 戏剧化妆
(11) 戏剧道具
(12) 戏剧灯光
(13) 戏剧音响
(14) 戏剧剪辑
(15) 戏剧字幕
(16) 戏剧广告
(17) 戏剧评论
(18) 戏剧研究
(19) 戏剧创作
(20) 戏剧演出



戏剧丛刊

一九八一年二月 第一期



17727



一九三六年，程砚秋和俞振飞演出《春闺梦》。



一九七九年夏，赵丹同志在本刊编辑部座谈会上。

张雅心 摄

Selected Essays of Theatre No. 1. 1981.

Main Contents

- Emancipate the Minds, Really Depict our Times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play writings today
by Zhou Yang (1)
- Exact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Effects of Literature
Assorb the Poetical Feelings from the Future
—Looking back the play writings of drama in 1980
by Zhu Hong (10)
-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theatrical task
by Du Gao Chen Gang (15)
- The influence of feudal remnants and the traditional drama.
by Liu Hou-sheng (25)
- Discussion with Comrade Li Shu
by Li Shu (36)
- Bringing forth the new from the old in traditional plays of
Chinese Opera
by Guo Han-chen (39)
- Performing arts of Cheng Yan-qiu
by Cheng Ren-jian (45)
- Cheng Yan-qiu's theatrical activities in 1923
by Feng Mu (61)
- I cooperated with Yu Shu-yan
by Cheng Yong-jiang (77)
- Harmony of acrobatics in Peking Opera
Posthumous work of
Mei Lan-fang (89)
- Reminiscence of the rehearsal of "Cai Wen-ji"
by Tong Chao (107)
- How Cheng Rong directed "Aesop" (sketches)
by Lin Ke-huan (121)
- Struggle of Slaves
by Huang Ke (138)

戏剧编丛

第一期目录
一九八一年二月

- 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周 扬 (1)
——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正确理解文艺的社会效果 朱 洪 (10)
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 杜 高、陈 刚 (15)
——八十年代第一年的话剧创作

戏剧问题论坛

- 关于戏曲工作的形势、问题和措施 刘厚生 (25)
封建残余影响与旧剧 黎 澍 (36)
和黎澍同志商榷 郭汉城 (39)
谈戏曲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 陈仁鉴 (45)
时代向我们提出更高要求 夏 阳 (51)
从积极方面提问题 文忆萱 (55)
小议“情节戏” 游 默 (57)
怕变·影射 (杂文两篇) 曾白融 (59)

舞台艺术

- 我和余叔岩合作 梅兰芳 (89)
京剧武打的美 盖叫天 (107)
《秋声漫记》再记 冯 牧 (61)
秋声漫记 冯 牧 (64)
程砚秋在电影《荒山泪》中的艺术创造 肖 晴 (70)
忆《蔡文姬》的排练 童 超 (114)
挥洒自如写赞歌 林克欢 (121)
——《伊索》排练场札记
红花·绿叶·小草 黄宗洛 (131)
艺术的真假之间 左 弦 (185)

古典戏曲研究

奴隶的抗争黄 克(138)

——《许妮子调风月》形象析

风尘珠玉 永驻光辉.....郭 亮(148)

——读《青楼集》小记

传统戏曲人物画像

法海 金玉奴 林冲 蒋干 李逵易和元诗 丁 聪画(152)

回忆录·传记

阿英在“孤岛”时期戏剧活动片断.....钱 毅(155)

《阿英在“孤岛”时期戏剧活动片断》附记钱 璎 钱小惠(168)

闻一多的戏剧活动王子光(170)

程砚秋在一九二三年的戏剧活动程永江 编撰 (77)

外国戏剧

悲剧特征(法)圣·埃佛尔蒙著 李健吾译(174)

京剧对西方戏剧的影响.....(美)里昂纳德·C·普郎哥著 胡冬生译(178)

剧种介绍

藏戏概况刘志群(180)

小资料·谚语动态

京剧净行老三派(京剧著名演员简介)董维贤(183)

扮戏不象 不如不唱钮 骝 苏 移(50)

唱腔是画儿 嗓音是色儿.....钮 骝 苏 移(69)

千学不如一看 千看不如一串.....钮 骝 苏 移(187)

消息十则

复刊词(188)

编后(173)

封面设计 赵友兰

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周 扬

今天，我想讲三点意见：第一，讲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第二，讲解放思想和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第三，讲如何看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干预生活”。这个讲话只是作为个人发言，讲得不对的地方，就请你们指正。

一 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

我们有些作品反映了当前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可以说是相当尖锐的题材：反映了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同官僚主义者、特权思想和党内不正之风的斗争。这些不正之风是人民所痛心疾首的。我们的文艺家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自从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家团结起来为四化出力，出现了许多新的、令人鼓舞的现象，值得我们拍手欢呼。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党内和社会上的许多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现象，青少年中的流氓活动和犯罪现象还时有所闻，能不反映，能不揭露，能不斗争吗？“无冲突论”是要不得的。因为它粉饰现实，麻痹我们自己。要同这些丑恶东西作坚决的斗争，问题是怎么斗争，怎么反映。

有一位作者说，我们反映现实中的黑暗现象，实在痛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心驱使我们这样做。嫉恶如仇，一个革命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就不成其为革命作家了。不只你们青年痛心，老干部绝大多数对这些现象也是痛心的。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要改变和克服这些现象，已经而且还在继续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开始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也不是那么容易迅速见效的。我们的作家很多都年轻热情，他们很容易被生活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所激怒，以至看不见生活中更经常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因素，而对于那些消极现象形成的原因，作为消极现象对立面的积极现象，往往缺乏冷静的全面的分析。所以，如何在作品中反映消极现象，就有

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你是站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反映这些现象，还是站在另外的立场，例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的立场来反映呢？如果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揭露，那是人民需要的。如果站在另外的立场，那对人民就不一定有利了。即使是真心想站在人民的立场，真心想为人民说话，如果观点不对，观察不深，表现手法拙劣，社会责任心不强，你也可以写出事与愿违、不利于人民的作品。有的作者提到表现这些消极现象要有切肤之感，要感到自己同人民是真正休戚相关的，不要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对。人民的作家应该站在人民之中，站在先进人民的行列，而不能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来反映问题，评论问题，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关于揭露黑暗的作品，我在这里要引证一下鲁迅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清末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崩溃，官场中出现了许多黑暗现象，当时一些多少有点进步思想的作家，曾在作品中对官场腐败现象加以抨击。鲁迅称这类作品为“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就是当时这类的著名小说。鲁迅对这些作品一方面给以肯定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它们的缺陷和不足。他是这样评论这些作品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和当年的所谓“谴责小说”根本不同，但对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丑恶现象的揭露，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我觉得鲁迅评论“谴责小说”的话，今天对我们还有意义。要针砭时弊，但也要真实深切，不可夸张失实，迎合时好。真实性和政治性，要结合得更好一些，艺术性要更高一些。这个问题解决好，就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和文艺的发展。

对一个有争议的作品，经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是一种好的方法，有利于发挥作家们的集体智慧和促进作家与评论家的思想交流。至于作者是否采纳，则完全有自由。对文艺创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作者自己也不能强制自己。有时作者感到别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也愿意接受，但作品究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着作者整个的思想感情，整个的心血，有的地方可以照你的意见去改，有的地方就无法去改。修改不是打补丁，而应当是天衣无缝。大家提出的意见虽是好的，但能否化为作者自己的心血，还要经过一番咀嚼和消化。谁也不能强制作者修改。这是不能勉强的。但也要看到，一个作品常常是要反复修改的，不要怕修改。一个剧本演出来，总是希望博得观众好的反响。我们不要曲意迎合观众，也不要盲从某一领导人的意见，但力求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注意社会效果，总是应该的。作者如果认为大家提的意见是对的，觉得自己过去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周，表现不当，现在要根据这些意见来作修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我们革命作家应有的责任感。作家要有主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风格，但不能由此而拒绝采纳群众的意见。

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中反特权、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但由此而同情骗子，同情犯罪，那就不妥当了。难道因为有官僚主义、有特权，诈骗犯罪就可以是合法的吗？要看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蕴藏有一种足以抵抗和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种种弊端的健康力量。要写出这种力量，才比较合于真实。不要说在我们新社会，就是在过去旧社会，骗子也是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把我们的社会写成骗子可以不受惩罚，那就连旧社会也不如了。当然，现在的剧中，骗子最后是受到了惩罚，但在精神上仿佛还是他胜利了，人们的同情还是在他一方面。作者的本意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但依靠骗子、罪犯来反对，岂不是越反越乱吗？对骗子同情，对受骗子之害的人民，又将置于何地呢？那位身居高位的老干部揭发骗子，多少带有一些

偶然的性质,而实际上又充当了骗子的辩护人。他对于官僚主义、特殊化的谴责,也只是道德式的说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我们希望这类作品能够改好。我前面说过,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机体,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要改,还是要通过作家自己的头脑,吸收消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经过重新构思才能改好,否则就不要违心地勉强去改。

作家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什么就一定要发表,要上演。他首先要考虑这种题材值不值得写,并不是什么题材都值得写的;还要考虑如何写法才好,发表出来是否于人民有利或有害。作家应有创作自由,但是否发表和上演,还要得到书刊编辑和剧团、电影制片厂的同意和协作,否则你有自由,别人就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那就是对“创作自由”的曲解,那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有政府管辖的地区都做不到的。我们的人民要思想活跃,要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要无政府主义,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持安定团结,并以此来统一我们的意志和行动。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人民才能生气勃勃。作家不论写什么题材,首先要考虑你描写的是否真实,因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单是真实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样的真实。有各种各样的真实,并不是任何真实都是真理。真实和真理是有区别的。我们追求真理,也重视艺术描写的细节真实,但如果这些细节描写无助于放射真理之光,反而使它暗淡和变色,那就不足取了。我们不掩盖我们社会中还有阴暗面,也不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它们,但我们又要十分注意方式和场合,决不要轻易授予人民的敌人以诽谤我们的把柄。要求一个作品在思想政治上和艺术上都修改得好一些,更少瑕疵,这并不是束缚创作的自由,而是对作品质量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作者的一种爱护和关怀。任何作品的发表和上演,都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这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起码应有的态度。

二 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我们的时代。现在是不是解放过头了呢?是不是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良现象都是解放思想过头的后果?我想不能这样说。文艺对社会有很大影响,文艺工作者对社会负有很大责任,应有高度责任感。但是决不能说现在思想解放过了头,只能说有些人对思想解放有误解,或故意曲解以便反对它。

所谓思想解放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种什么东西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然后才有要求解放思想的运动。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也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也好,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好,无不如此。要打破中世纪的黑暗,迎接新时代的黎明,才有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武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中间反复斗争几百年。不要以为思想解放是那么容易的事。中国受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鼓吹科学和民主,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们才好容易从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旧教条的千钧重压下开始解放出来。后来,从外来的新思潮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又产生了洋教条主义。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这种新教条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林彪、“四人帮”却又利用毛主席在人民中的无上威信,把他的片言只语当成教义,大搞现代迷信。要破除这种迷信,解脱思想束缚,就必须重新解放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束缚,思想解放不就成了无的放矢吗?现在我们对林彪、“四

人帮”的极左路线以及他们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残余势力和思想毒害，决不可低估。当然也要从其他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主要还是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本来思想解放不发生什么过头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思想不活跃，思想停滞不前了，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党，还有什么前途呢？思想解放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类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飞跃是没有止境的。从历史长河的观点来讲，这种飞跃是会永远存在，人的视野，不论如何扩大总是有限的，情况又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总有些新东西是你不认识的；遇到新的问题，旧的思想又往往束缚你，你就要突破它，才能前进。所以，思想解放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文艺界，特别是这三年以来，思想很活跃，这是件大好事。当然思想活跃不可避免地要出些偏差。按照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的原则，思想解放是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解放就是使我们的思想同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所谓不够，就是现实发展了，人民前进了，而我们的思想却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思想脱离实际，跨越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经过程，就是过头。但那是主观空想，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所以解放思想，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要滑到邪路上去了。那决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只是对思想解放的曲解和嘲弄。

我们现在提倡思想解放，目的就是为要正确地认识我们今天的世界，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认识我们今天自己国家的形势。胡耀邦同志讲，现在我们是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期，在这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东西是不会那么容易消亡的，新旧力量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而又复杂。新旧互相交替，新旧又互相交错。新东西里面残留着旧东西，旧东西里面又孕育着新东西。有的时候，新东西采取了旧形式，旧东西披上了“新”外衣。在这样的时代，要很好地正确地认识和分辨它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新旧交替，新旧交错，也就是新旧斗争的时刻，人们思想上必然会引起一些混乱和波动。特别是在富于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这种波动可能更明显。现在人们不是说我们的青年是思考的一代吗？每当社会处于动乱和变革的时期，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会发生较大的动荡，大家都要思索问题，探求出路，这就会促进思想的活跃。我看，这是件大好事，思想停滞僵化才是坏事。思想活跃了，你这样思考，我那样思考，你这样主张，我那样主张，就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也必然会出现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意见。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识别和争辩，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只会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和斗争本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几次大的历史转折，都引起了思想的混乱，也促进了思想的发展。看一看历史，俄国革命第一次失败，那时思想界、文艺界发生多大的混乱！什么色情主义、颓废主义，风靡一时，所以高尔基说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是“最无耻的十年”。为什么无耻？因为革命失败了，思想动摇了，一些腐朽反动的思潮和流派都冒充新事物而出现。一些倾向过革命的人忏悔了，背叛了革命。当年高尔基自己也犯过错误。他自己也搞造神派，他想造个上帝来维系人们的信仰。列宁从爱护高尔基的立场出发曾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败坏了十月革命的荣誉，其影响所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当时，在东欧则爆发了波匈事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次空前未有的大波动。

由于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现在有一些人，不只是青年人，也有中年人、老年

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党失去信任,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这种现象值得严重注意。这也是一种大的思想波动,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思想动摇。思想活跃,敢想敢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人们的思想对革命也发生了动摇,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也不相信了,那就很危险,对“四化”建设和安定团结都不利,那就应当反对。怎样帮助人们,特别是帮助青年端正世界观,正确地引导他们去认识这个时代,表现这个时代,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这个时代,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有些事情大家一时迷惑不解,所以提出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客观实际在变化,思想要跟上这个变化,适应这个变化,促进这个变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点,除了要经常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外,就是需要努力掌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它来观察一切问题,应付一切变化。思想解放并不是不要思想,人总得有个思想,不是正确的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你说我什么思想也不相信,那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就是叫做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反对迷信,相信科学。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对社会主义,我们也只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要搞感情的社会主义,感伤的社会主义。当然,一个革命作家,没有感情,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是没有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更不行,单单有愤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愤怒出诗人”,但不一定出真理。我们爱诗人,但更爱真理。有的作家在作品中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帮派势力,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是站在人民立场的,但对人民群众中的一些不正确、不健康的東西,例如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有害倾向,他们就不那么反对,甚至予以共鸣和同情。人们常常把文学比作镜子,好象看到什么就要写什么,但人毕竟是有思想的,作家尤其要有思想,他要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法,决不可能毫无选择,毫无偏袒,毫无爱憎。人们又说文艺是“解剖刀”,社会机体中有“毒瘤”,它就要动手术。作品中写了社会中的黑暗,只能怪社会不好,不能怪作品无情。但是作家如果是一个庸医,手术并不高明,就不但割不掉毒瘤,反而有使毒瘤扩散,加速有机体死亡的危险。作家不能没有责任感,其道理就在于此。

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要反对,问题是不能由此而同情盗窃犯、杀人犯和骗子。这是一个是非界限。不能说写的这些事情不是真实,至少有部分的真实,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真实的都要写。海淫海盗的书不也写了一定的真实吗?

黑格尔有两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对这两句话作了极为精辟的发挥。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确是很精彩的。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既反映了他思想的反动的方面,也反映了他革命的方面。“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既然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合理的,那末盗窃犯、杀人犯和骗子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就是它有其存在的根据。黑格尔这样说,实际上就是为现存秩序辩护,因此被一切力图维护现存统治的反动阶级的人们所欢迎。但是黑格尔还有一句话,“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一句话就反映了他的革命性。有盗窃诈骗,就有反盗窃诈骗,前者因有其存在的根据,是现实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后者因是合理的,合乎现实的需要和发展趋势,因而更是现实的。作家要把两个现实、两个合理都写出来,而更着眼于后者,因为后者才是更现实、更合理的。海涅是黑格尔的朋友,看到黑格尔前一句话很不满意。他问黑格尔,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当时,黑格尔看看周围没有人,说:你不知道我后面还有一句,“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黑格尔当时还怕有人偷听到他

的话，会说他在鼓吹革命。因为革命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所以说这句话反映了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我们的文艺也应从这两句话里得到启示，既要反映生活的真实，也要表达革命的理想。

我们的文艺家应当有理想。作家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总是要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追求。一个革命的作家没有一点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感情，革命的意志，怎么叫革命的作家呢？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作家的责任是更加重大的。他们的作品和言行，都是人们所关心，所注目的。不能说作家只要讲了真话，就算是尽了责任。还要看看这个真话，真实的程度如何，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的需要，真正对人民有利。

现在有人讲要恢复“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要回到“五四”，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才是现实主义的，至于后来的什么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至全国解放后产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作品，似乎都不是现实主义的，至少不是那么现实主义的，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又有人称我国近三、四年来的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为“新现实主义”，似乎不在此例的作品都不是现实主义或至多只能称之为“旧现实主义”，这也是不恰当的。我们过去一些时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不够，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现实主义就完全被糟蹋了，现在重新强调革命现实主义，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要在今天新的条件下，以新的精神来恢复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

总之，我们今天的文艺不能退回到“五四”时代去。我们今天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要和时代相结合，要有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我们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艺，要继承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但也不能全盘继承。“五四”离现在究竟是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我们的国家不管经历了多少历史曲折，比起那时来不知前进有多远了。怎么能全部承袭过去的东西呢？左翼文化运动中，曾有过“左”的偏向，例如号召脱下“五四”的衣裳，贬低“五四”式的白话，那是不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就整体而言，比现在还高明，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茅盾、叶圣陶同志等最老一辈的作家当然知道得最清楚，也最有权威来判断。至于欧洲十九世纪的和现代西方的文艺，我们应该借鉴，但也要有所选择，有所评判，只能吸取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长达十年之久，我国人民和青年对西方文化长期隔膜，以致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以致竞相模仿。这也可以说是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惩罚。当然，过去文化中确有许多好东西，但不能把一些本来不好的、应该批判的东西，当做新的东西来宣扬。学习过去的文化遗产，无论如何要有所选择，有所批判。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以革命精神来从事工作和创作，用革命的作品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和青年的。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事业，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三 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文艺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这确实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但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题,他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但也不能由此就说人的命运,完全是由政治来决定的。文艺也不能说完全是从属于政治。回顾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从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革命文艺运动就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文艺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在处理文艺和政治关系的问题有过一些“左”的偏差。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文艺成为了广大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作用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而不只是政治生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这就是说,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宣传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社会科学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革命,它是与剩余价值学说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但为了宣传这个真理,就不免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以至有人就把这种作用当做唯一的了。似乎只有经济起决定作用,其他因素都不起重要作用了。恩格斯晚年就为此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和马克思两人都因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他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忽视了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因为看到别人甚至他的门徒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庸俗化了,就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打棍子,只是幽默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虽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要通过的中间环节往往是政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要受政治的影响,也要受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蒂最后还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过去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看成绝对的,认为文艺本身的历史,是一个不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独立发展的过程。好象它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经济、政治的背景,这当然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在否定文艺发展的绝对独立性的同时,连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掉了,这同样也是不对的。

因此,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了文艺除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接受其

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林彪、“四人帮”在其长期反动宣传中,一方面叫嚣反对什么“唯生产力论”,否定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叫嚣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的作用提到吓人的高度,以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们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从历史上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来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时代,封建主义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文艺不能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但并不等于文艺一定要从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它更多地是受封建宗法道德等儒家学说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也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就是讲为政治服务吧,也要分清是什么政治,是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你也为他们服务吗?就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也要看这政治是正确还是错误。你能为错误路线,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服务吗?我们所讲的政治,主要是指总的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而不是指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应违背我们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但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配合当前的具体政策和工作任务。根据各种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的比较直接、密切,有的则比较间接、疏远,比如山水画、风景画、抒情歌曲、舞蹈等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

再顺便谈谈文艺“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所谓“干预生活”,主要就是要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干预当前的政治问题。假如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把文艺置于从属的地位,而“干预生活”,则反过来,把政治置于从属的地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文艺两者关系的问题。文艺可以干预政治生活,但也不能把文艺凌驾于政治之上。文艺的职能本来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影响政治,对政治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现在人们讲文艺干预生活,通常只是指那些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描写社会的消极现象,可以有助于克服那些现象的作品,而对那些描写人民生活中先进事物,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积极作用的作品,却不叫干预生活。这和这个口号的来源,以及这类文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有关系的。这个口号好象是五十年代苏联一位作家提出来的。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

看到的不是像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干预生活”。这个作家后来到中国来过，我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也和他交谈过。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象只有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就片面了。文艺既然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从广义的意义上讲，都是干预生活的。写革命战争，写土地改革，写地下斗争，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的许多作品在人民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难道还不算干预了生活，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他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算是干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多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作家眼界要广阔，题材要多样，取材要广，选材要严，挖掘要深。我们提倡题材应当广泛，要多样，在题材问题上不要加以限制，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本刊发表时作者有所修改。



正确理解文艺的社会效果

朱 洪

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正式提出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以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有的同志同意这种提法，也有的同志否认社会效果的存在，有人把它抓在手中当作一根棍子，也有人把它看作“收”的标志，因而感到某种压力。即使在同意这一提法的同志中间，观点也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效果问题理解上的分歧，已经成了文艺创作和评论工作的一种阻力。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怎样分析文艺的社会效果的问题。

—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明确提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从这段话的提出到现在，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创作实践上看，要求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正确的。

社会效果这一命题的正确，首先在于它是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的产物，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予文艺以极大影

响的必然结果。

建国以来，我们党曾经两次号召解放思想。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但是，由于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不讲实事求是，不尊重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思想解放陷入了盲目性，走上了歧途。在文艺领域中，出现了一批严重脱离生活的、虚假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浮夸风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当时的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三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为思想解放运动指出了方向。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破除现代迷信，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的讨论，就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文艺上的进一步深入。既然文艺作品要由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评定，那就必然存在一个社会效果问题。因此，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维护实践的权威性，它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是这一时代潮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任何把社会效果和思想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社会效果这一命题的正确，还在于它体